

新观察

北医三院乔杰院士团队在《柳叶刀-全球健康》杂志发表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约1/2的不孕女性在一生中曾遭受过亲密伴侣暴力,暴力发生风险是正常育龄女性的2倍以上。专家提示——

不孕女性更需被温柔以待

本报记者 刘喜梅

“在针对不孕症夫妇的诊疗过程中,除了疾病本身导致的病理改变和生育障碍之外,还应关注不孕不育给女性及其家庭带来的一系列心理和社会问题。其中,针对不孕女性的家庭暴力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全球性问题,而亲密伴侣暴力又是家庭暴力中的常见形式。”5月11日,《柳叶刀-全球健康》杂志在线发表了北医三院乔杰院士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呼吁关注不孕女性群体面临的暴力问题并采取适宜干预措施。

这是一项针对全球范围内不孕女性遭受亲密伴侣暴力流行情况和适宜干预策略的综述研究。北医三院国家妇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媛媛、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生傅郁为该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北医三院国家妇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乔杰院士、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David E. Bloom为该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

不孕女性遭受家庭暴力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全球性问题

不孕症是威胁女性生殖健康的重大全球卫生问题,世界各国报道的育龄人群不孕率约为10%~30%不等。根据北医三院乔杰院士团队开展的全国育龄人群生育健康监测数据显示,我国育龄人群的不孕率已从2007年的11.9%上升至2020年的17.6%,估计目前约有3300万对育龄夫妇面临不孕问题困扰。

“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快速发展,不孕症治疗成功率和安全性极大提升,已帮助众多不孕夫妇成功生育健康后代,我国每年约有30万例辅助生殖技术助孕分娩的新生儿出生。但在不孕症夫妇的诊疗过程中,家庭暴力仍然存在且被忽视。”研究团队表示,纳入荟萃研究的文献中有3篇来自中国的报道,其中的数据显示,中国不孕女性在过去12个月内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总发生率为10.5%~26.9%之间。

全球的研究结果则显示了更严峻的情况。

记者了解到,乔杰院士团队开展的这项研究,项目团队分析了截至2021年9月30日之前全球范围内公开发表、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30项相关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证据来源于尼日利亚、埃及、卢旺达、土耳其、伊朗、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和中国等9个国家。结果显示,不孕女性在过去12个月内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总发生率为36.0%,其中:心理暴力24.6%、躯体暴力11.9%、性暴力8.7%、经济胁迫2.6%。不孕女性既往曾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总暴力流行率为47.2%,其中:心理暴力51.5%(由于数据来源不



同略高于总暴力流行率)、躯体暴力20.2%、性暴力11.5%、经济胁迫9.8%。与正常育龄女性相比,不孕女性更易遭受躯体暴力(约2.03倍)和性暴力(约2.55倍)。

“根据研究结果不难发现,总体而言,1/3以上的不孕女性在过去12个月内遭受过亲密伴侣暴力,约1/2的不孕女性在一生中曾遭受过亲密伴侣暴力,不孕女性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发生风险是正常育龄女性的2倍以上。不仅如此,研究还显示,不孕女性也更易遭受来自家庭其他成员或社区同伴的歧视和心理暴力。”王媛媛进一步介绍,以上数据来源于9个中低收入国家,不同研究在调查年份、调查地区、调查工具、样本量大小和偏倚风险评估等方面的差异较大,但这也提示,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针对该研究问题的重视不足。

“以人为本、以科技为引领”促进生殖医学高质量发展

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现象是,在30篇被纳入荟萃分析的全球文献中,3篇来自中国的文献报道表明,我国不孕女性在过去12个月内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总发生率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另一项由北医三院国家妇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牵头,目前正在全国开展的中国不孕女性家庭暴力流行病学调查项目,也证实了上述现象——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中国不孕女性遭受各类型

暴力的发生风险相对较低,且主要是以轻度暴力为主,这主要归因于我国在促进性别平等和提高女性社会地位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

“需要说明的是,纳入荟萃研究的3篇国内文献,由于调查年份较早、样本量偏小、缺乏代表性等问题,还有必要进一步开展全国性流行病学调查获得最新的高质量研究证据。但这三项研究,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不孕女性人群遭受暴力的风险高于正常育龄人群。因此,亟须关注不孕女性群体面临的暴力问题并采取适宜干预措施。”王媛媛介绍。

家庭暴力常见又隐秘,对受害者往往是难言之隐。在不孕门开展暴力筛查和咨询能够有效促进亲密伴侣暴力的早期识别和干预,然而目前尚缺乏专门针对不孕人群的暴力筛查工具和咨询策略。

“性别不平等是造成不孕女性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深层次根源,应从立法保障、政策执行、社会环境等多维度综合解决针对不孕女性的亲密伴侣暴力问题,以进一步促进女性生殖健康和平等权益。因此,应积极开展多学科、跨部门、国际合作的暴力预防及干预策略研究,为全世界范围内及各国制定优先研究领域及政策行动提供循证依据。”在文章中,乔杰院士团队建议。

研究团队的建议,也获得了世界同行专家的响应——《柳叶刀-全球健康》杂志同期刊

登的社评文章指出,乔杰院士团队的这项最新研究成果对于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意义重大,迫切需要长期受忽视的不孕症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心理和社会问题纳入全球生殖健康及政策议程。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Sarah Murray教授及团队则在上述评文中指出,该项研究为全球不孕女性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流行情况提供了关键科学证据,并明确提出了下一步的优先研究领域、干预措施和政策行动;基于现有证据的局限性和异质性,迫切需要在全球及区域范围内进一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开发专门针对不孕人群的暴力调查工具并进行跨文化适应性研究;质性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暴力产生的个体、社会和文化根源,可以帮助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开发出更适宜、更有效的综合干预策略等。

“所以我们团队呼吁,为进一步提升生殖医学领域的高质量发展,不仅依赖于临床诊疗新技术新方法的持续革新,而且还需要更多地关注生殖障碍性疾病对个体、家庭和社会等不同层面健康福祉和整体发展的影响。在国际研究协作网络以及国家级临床研究平台建设过程中,不仅需要重视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理工学科之间的交叉创新,还应重视临床医学与公共卫生、人文社科等多学科之间的交互融合,促进‘以人为本、以科技为引领’高质量照护服务模式创新发展。”王媛媛最后表示。

建言 JIANYAN

“上门核酸采样包”2.0版本应加快推广应用

沈绍春 毛春美

为确保在全民核酸检测采样中“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各地纷纷推行“上门采样”服务方式,可为居家隔离人员和行动不便人员等特殊群体筑牢健康防线。而穿着防护服上门采样服务的医务人员,要做的准备却非常多。除了大量采样棉签、一次性手套、医用标本袋之外,还要随身携带手消毒液、采样管、对讲机、扫码机器、医疗废物专用袋等物品,大包小包一大堆,找起物品十分麻烦,常常遇到采样物品无处安放、操作“手忙脚乱”困扰。如果一次采样量大,或者需要在楼宇中上下奔波,极为不便,而且可能有遗漏等风险。为了解放双手,全国很多基层医护人员通过自制“上门核酸采样包”提高服务效率。但还是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采样包制式混乱,缺乏统一标准和规范。各地自制的“上门核酸采样包”形状不一、款式不一,材料简陋,容易滋生病毒并有交叉感染风险,且易破损,存在诸多不安全因素。据援沪医疗队队员、丽水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医师张建利反映,因为无法固定,在使用自制的采样包过程中上下楼时,相关物件很容易掉出来,使用时的移位也给工作带来不便;又据浙江丽水云和县人民医院护士陈兆燕反映,在南山小区一户居民家采样时,因忽降暴雨,腰间的塑料袋被楼道风吹到护栏挂物而破损,幸好紧跟其后的社区干部及时发现并拽住塑料袋下面完整部分,才保住了采样包里的物资安全。

二是自制“上门核酸采样包”污染环境,降低标本的准确性。由于自制上门核酸采样包制作过于简单且用材不科学,极易导致医疗废弃物掉落外面,造成二次环境污染。同时,因核酸采样本长期裸露在外,对核酸采样标本的准确性也带来一定影响。据云和县卫健局基层公共卫生科干部刘春炜反映,随着上门采样数量的增加,自制上门核酸采样包的开口会越来越小,不仅袋内的医疗废弃物容易掉出,而且采样本长期裸露,随着服务时间的延伸,会降低标本的准确性,急需更加专业、便捷的上门核酸采样包代替目前简陋的上门核酸采样包。

三是缺乏有效采样包支撑,人员配额存在不经济情况。由于自制“上门核酸采样包”制作过于简单且不规范,无法真正解放双手,一位工作人员无法单独完成,

需要两位工作人员配合才能完成工作,在疫情吃紧的情况下,非常浪费人力物力。

据云和县疫情防控办专班人员阙文亨表示,4月26日,云和县突发新冠肺炎疫情,该县迅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并根据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在核酸检测中的困难,组织医务人员开展上门采样,由于缺乏规范的核酸检测便携包,需要2-3人一组合入户检测,极大影响检测效率。

与此同时,上海长宁、普陀、嘉定、松江等区都已推广应用“核酸采样包”。该包一方面可以完全解放医护人员的双手,在减负的同时,还可以更高效、更专业、更规范地完成核酸采样工作;另一方面,原来需要两人配合才能完成的工作,只需一个人就可以轻松完成,工作效率提升了一倍。

为此,我们建议:

一是研究制定全国统一标准。借鉴上海经验,研究制定全国统一标准“核酸采样包”2.0版本,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出修订完善标准,相关部门统一制定核酸采样包标准。采样包要具有合理性和优越性特点,首先材质上需要专家进行综合研判,要求既不会造成交叉感染,又不会增加工作人员的负担;其次在设计上,要更加全面地考虑上门采样工作的特点,将采样所需物资分门别类摆放,减轻采样人员的工作量。

二是批量生产推广应用。设计了统一标准“上门核酸采样包”2.0版本后,以招投标的形式由企业定点生产,商务部、国家医保局等单位要加强采样包的产品质量监督,确保生产、流通的采样包满足国标技术。国家卫健委、疫情防控办等单位可以定向在上门多、山路多的山区等有疫情地区率先开展试用;试用后再由试用地提供反馈意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再根据意见进行适当修改完善,国家疫情防控办牵头在全国大范围推广应用。

三是紧急纳入政府采购目录。建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单位将“上门核酸采样包”纳入政府采购目录,并在中央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的通知》(财办库[2020]23号)的规定基础上,由各部门、单位自行组织采购。

(作者沈绍春系农工党丽水市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丽水市政协常委,毛春美系丽水市云和县政协委员)

民革厦门市委会:

打造“8分钟急救圈”完善“院前急救体系”

本报记者 照宁

“疫情对院前医疗急救提出了更高要求。”民革厦门市委会近期在调研中发现,近年来,我国院前急救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受疫情影响,快速增长的急救需求与现有急救能力之间存在的差距依然明显。

以厦门市为例,院前急救存在着急救反应时间长,急救设备配备不足,急救人员流失严重,急救人员业务水平不高,居民自救能力偏低等问题。对此,民革厦门市委会建议,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立足市情,由厦门市人大审议出台相关《厦门市院前急救条例》,对社会急救免责的法律规定进行细化和补充,在规范紧急救助者施救行为的同时保护民众的善举,更好地体现社会急救免责的立法初衷。

“建设完善综合型院前急救网络体系模式,在整合现有院前急救资源的前提下,不断延伸社区急救站的建设,打造‘8分钟急救圈’。”民革厦门市委会建议,建立综合型三级院前急救网络,把急救网络延伸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所等最基层的服务机构,让社区中每位成员都成为应急处置中的重要力量之一。同时,强化政府职能,加大投入,

优化通信设备,增加运输设备,增加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对院前急救设备使用率,使院前急救抢救成功率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

对于加强院前急救人才队伍的建设,民革厦门市委会认为,应面向专业医学院校招收新人,面向社会不拘一格地广纳良才。轮流将中心年轻骨干送到三甲医院及高等院校进修学习,提高业务水平,使其能为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参与安全科普场所的规划、建设和完善等工作,让更多的人通过这种集知识性、教育性和互动体验式的培训方式,更好地掌握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和技能。

国际家庭日共话“家事”:这届年轻人卡在哪儿了?

本报记者 刘喜梅

2022年5月15日是第29个国际家庭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家庭服务部等单位指导下,国家家庭报社主办了“健康家庭 生育友好”2022年“国际家庭日”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旨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要求,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构建生育友好环境,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

从爱情到婚姻,年轻人卡在哪儿了?

日前,全国多地民政部门陆续公布了2021年婚姻登记数据,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初婚平均年龄普遍推迟。例如,2021年安徽省初婚平均年龄突破30岁,为男31.89岁,女30.73岁;2021年江苏省初婚平均年龄为27.29岁,其中男性28岁、女性26.52岁,与2020年相比,男性平均初婚年龄略有推迟。据此,有专家表示,年轻人群的婚恋困惑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对于这种婚育困惑,北京市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齐大辉表示认同。他说,“近年来出现了一种

‘恋而不婚,婚而不生,生而不教,教而不灵’的婚育众生相。这些严重影响到人口的数量和家庭的结构,是长期积累的综合性社会环境与家庭文化问题。青年人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终身伴侣,怎样经营情感生活,需要学习和成长。因此,做好婚育方面的家庭教育非常重要。”

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张晓冰看来,降低年轻人对婚姻的困惑甚至恐惧心理,要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要加强婚恋观教育。一方面,将婚恋教育纳入中高等院校教育体系,引导青年人树立理性的婚恋观。另一方面,要引导父母尊重子女的婚恋选择。第二,帮助青年人解决婚恋实际困难。第三,推动更加平等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

“结婚由过去人生规定的‘必选项’变成了自主决定的‘可选项’。因此,在未来,政策方向应该更加支持青年职业发展,尤其要保障女性的就业公平,促进青年人婚育和工作共同发展。”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茅彦彦建议。

对于年轻人婚育困惑,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心理服务研究中心管委会副主任倪子君则进一步表示,步入婚姻后低成本经营好婚姻关系,对于

构建幸福和谐的家庭非常重要。她建议,“在交往过程中,如果无法避免冲突,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法,注重肢体语言、语调、表达内容,使用正确的方式进行沟通至关重要。”

探索家庭场景下的生育友好新路径

“生不起”“入托难”等问题,也是年轻群体面临的重要生育困惑。

对此,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二级巡视员张伟表示,全国总工会聚焦职工关切,正在通过编制《创建家庭友好型单位托育服务手册》等措施来做好用人单位托育服务工作。她介绍,下一步,全国总工会将推动全国各级工会开展托育服务试点工作,从多方面解决政策支持、资金支持等问题,并推动创建“六个友好”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

“从全国来看,目前已有部分地区开展了托育服务试点工作,托育服务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比如,部分地市和县区开办了综合托育服务机构,社区建设了托育服务设施,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了托班,家庭开展了互助式托育,工作场所提供了福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家庭处副处长陈展介绍。